

《一件小事》的空间读解

李国栋

一

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随笔，叫《一件小事》。

1917年冬的一天，“我”一早坐人力车外出，在北京的S门附近，车夫挂倒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由于这个交通事故，“我”不得不中途下了车。——在这篇随笔里，鲁迅只写了这么“一件小事”。不过，他却得出了一个不“小”的结论。“我”本来不想让车夫去管老太太，但车夫却扶起了她，并主动搀扶着她去找警察。于是，“我”发现了车夫的伟大之处，同时也觉察到了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最后，“我”掏出“一大把铜元”，托警察交给了车夫。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是《一件小事》中最精彩的一段描写。平心而论，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能够发现地位低下的车夫有优良的品格，并给钱加以褒奖就已经难能可贵了，何况还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小”呢？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鲁迅人格上的善良与伟大，并为之感动。但是，依照文本理论仔细阅读这篇随笔后，我们发现，鲁迅之所以能够这样反省自己，除了人格上的善良与伟大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

二

车夫挂倒老太太为什么是“一件小事”呢？文本为读者提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时间：“民国六年”；第二个是地点：“S门”附近；第三个是老太太的服饰：“衣服都很破烂”。

车夫挂倒老太太这件事如果发生在2002年的今天，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是“一件小事”。例如，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用前车角挂倒了一个老太太，无论从事事故后果来讲，还是从道义上来讲，我们都不能说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件事发生在“民国六年”，即1917年。从这个时代背景来看，被视为“一件小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夫在“S门”附近挂倒老太太可以说是被视为“一件小事”的第二个原因。参看当时的北京地图（末页所附地图），“S门”有可能指宣武门，也有可能指西直门。但从鲁迅当时的情况来看，这里的“S门”肯定是指宣武门。鲁迅当时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即地图左下方“菜市口”以南的⑰。鲁迅当时在教育部工作，而教育部就在宣武门大街，即“宣武门”上方第一个十字口附近的

②。因此，他上下班必经过宣武门。但西直门则远离鲁迅的住所和上班地点，再加上当时西直门外一片荒芜，作为教育部高级官吏的鲁迅是不可能去那里的。

当时，宣武门外属于北京的下等人居住区，多为穷人、俳优、乡下人及外地人居住。车夫这个身份就告诉读者他是下等人，老太太的“破烂”衣服告诉读者她也是下等人。在下等人居住区里下等人撞下等人，这在绅士眼里，当然就是“一件小事”了。

“一件小事”发生的时候，鲁迅虽然已是穿着“皮袍”坐人力车的高级官吏，但因他本人还住在下等人居住区，精神上还留有作为外地乡下人的自悲感——“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这句话就是例证，所以他还不可能从更高的层次思考这件“小事”的意义。换句话说，当时，鲁迅与车夫及老太太同处一个空间，精神上并没有仔细观察他们的余裕。“一件小事”发生在1917年冬而《一件小事》却并非创作于1917年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

《一件小事》最初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的《晨报·周年纪念增刊》，收于《呐喊》时篇尾所写的“1920年7月”纯属鲁迅本人的误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该处注解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察看鲁迅1919年11月的日记，我们可以大致推定出《一件小事》的创作日期。

19日晴午后得晨报馆信

22日晴上午寄晨报馆信

24日晴下午寄晨报馆信

从《一件小事》的发表时间倒推，19日下午晨报馆的来信应是邀请鲁迅写文章的信。22日，鲁迅接受了晨报馆的邀请，并回信答应马上为他们写一篇文章。24日下午，鲁迅寄出了写好的《一件小事》，而且一个星期后便见报了。写好到发表的这一个星期正符合一般报馆接稿、审稿、排版、印刷所需要的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鲁迅是在1919年11月22日晚至24日上午这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创作出《一件小事》的。

晨报馆邀请鲁迅写文章，但鲁迅写什么都行，并不一定非写两年前的那件“小事”。但是，鲁迅偏偏写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至于这里的原由，我们仍然可以从鲁迅1919年11月的日记里找到。

4日晴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湾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

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迁入八道湾宅

1919年11月21日，鲁迅搬家了。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搬到了新街口大街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宅院里。当时，新街口大街八道湾一带属北京高级住宅区，八道湾十一号是一个标准的大四合院。它显示着主人高尚的身份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鲁迅的月工资是300元，而为鲁迅拉车的车夫大概月收入在10元左右，为车夫和老太太调停的警察工资更低，每月仅能拿到7元左右。比较一下，鲁迅的收入是他们的30多倍！鲁迅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高的收入，才能一次付清一千三百五

十元而住进这样的豪宅。

当然，鲁迅此次搬家的目的是阖家团聚，而不是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经济实力，这一点从他搬家后马上就回故乡把母亲接来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此次搬家在客观上使鲁迅从下等人居住区搬到了高级住宅区，从而使他对下等人产生了绝对的优越感。恐怕在那个时候，鲁迅才真正感到自己不是“乡下人”了。

搬家以前，鲁迅虽然在身份和经济实力上远远超过了下等人，但在空间和精神上仍然与他们同属一类。但搬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搬家使鲁迅在空间和精神上也远远超过了下等人。

鲁迅从“绍兴会馆”搬到新街口大街八道湾十一号是11月21日，创作《一件小事》是1天后的11月22日晚至24日上午。从搬家与创作的如此紧密的时间联系上可以看出，此次搬家无疑给鲁迅提供了创作《一件小事》的契机。

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叫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

这段引文中所说的“一条洁白的大道”指的就是地图左边“新街口大街”至“宣武门大街”的这条大道。据鲁迅日记记载，搬家后的第一天，即11月22日下午，鲁迅去了“琉璃厂”。“琉璃厂”位于地图下方，“西河沿”以南的十字路口一带。要从“八道湾”去“琉璃厂”，就必须走“新街口大街”至“宣武门大街”的这条大道，并经过宣武门。那天，鲁迅坐人力车顺这条大道自北向南而来，也就是说，鲁迅第一次从高级住宅区向下等人居住区驶来。这时，坐在人力车上的鲁迅肯定油然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而且这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使他在通过宣武门时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那件“小事”发生的时候，鲁迅恐怕是坐人力车从绍兴会馆去宣武门方向。这种由南向北，而且是仅限于下等人居住区内的空间移动是不能使鲁迅产生优越感和观察余裕的。但是，两年后的现在，鲁迅由北向南驶来，由北向南的空间移动使鲁迅的视线由高向低，使鲁迅在精神上变得超越自由。这样，他就获得了仔细观察下等人的余裕。再加上他人格上的善良与伟大，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车夫这个下等人的伟大之处，同时，内心深处也产生了一种作为绅士的歉疚，并对自己过高的身份和过多的金钱感到了羞耻。于是，“我”便掏出“一大把铜元”，托警察交给了车夫。《一件小事》里写道：“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但11月22日晚从“琉璃厂”回来，提笔创作《一件小事》的时候，鲁迅肯定是“思索”了很长时间的。总而言之，《一件小事》中“车夫”的高大形象是鲁迅伟大人格与高尚身份的折射，而“我”作为绅士的自我反省则是人格的善良与精神上的优越感所致。在这里，善良而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身份固然都很重要，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为鲁迅提供精神上的优越感的，正是1919年11月21日的那次搬家。没有那次搬家，就不会有《一件小事》。这层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件小事》的空间，即“S门”以及“新街口大街”至“宣武门大街”的那条“洁白的大道”上清楚地读出来。

附记：篇末附上当时的北京地图。此地图原为分页地图，收录于日文版《鲁迅全集》（学习研究社，1984年11月～1986年8月）第十九卷。为便于整体把握，笔者对它进行了一些剪接加工。

70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tting of "Yijian xiaoshi"

(北京地圖)

參考圖釋·文獻(北京地圖)

參考圖釋·文獻(北京地圖)

